

回應黃碩然分齡培育的 教牧領導策略

袁沛充

黃碩然博士一文嘗試從兩方面討論這專題：第一是分齡培育的探討；第二是教牧領導的策略。在第一部分——分齡培育的探討中，首先提出分齡培育的重要性，從教會現況、社會學及聖經角度三方面論述。其次提出分齡培育的取向，分別是目標、需要、彈性及人本的取向，讓讀者有清晰的觀念與指引作為分齡培育事工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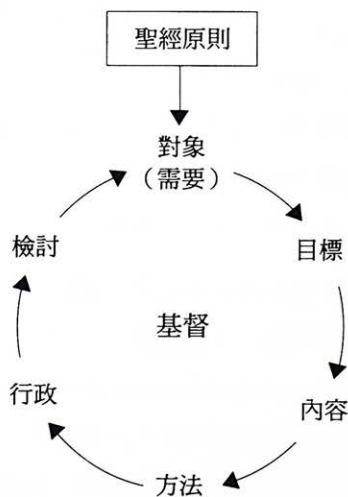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的內容可以說是宗教教育哲學的探討，簡單來說就是分齡培育事工與方法背後的哲學基礎討論。每一個事工與方法背後必有其假設與理念，我們如何 (How) 去做是受到我們為何 (Why) 去做所影響的。正所謂哲學先於方法，背後的哲學影響我們當前的方法。作者先在第一部分討論分齡培育的重要性及各種取向，就是一種宗教教育哲學的探討，讓讀者有清晰的觀念與指引，才在第二部分討論分齡培育的施行方法。哲學先於方法，正是本文最大的優點。

分齡培育的探討在宗教教育學來說，就是宗教教育對象的研究。其實只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人是甚麼、人有甚麼需要？當我們能清楚回答這個問題時，就可以有效地實施分齡培育的事工。深入而言，正是聖經人觀的探討，究竟聖經如何看人、人是甚麼、人有甚麼需要？其中重要性是從聖經的人觀建立一個神學眼光，檢視社會學、心理學及教會現況所帶來的各種思潮與方法，從而作出本於聖經真理的教牧領導方

向與策略。否則作為教牧的我們便容易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心理學家如何說，我們便如何作；社會學有甚麼方法，我們便跟著幹；教會中流行甚麼理論與模式，我們便全數採用。如果作者能夠在聖經人觀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定能帶給我們更清晰的神學眼光作分齡培育的事工。

第二部分內容是教牧領導的策略，哲學之後是事工的探討。作者先討論分齡培育的實施，提出八個實施的原則，深入而詳盡，頗具參考價值。繼而討論分齡培育的領導角色，分別探討牧師與教師的分工角色、宗教教育主任職分的需要，牧師如何在宗教教育事工上擔任督導等。綜合而言，此文實屬一篇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宏文。

第二部分可以說是宗教教育行政的研究，分析如何將宗教教育的理論具體而有效地實踐在堂會事工上。黃博士已深入而詳盡的為我們介紹了各種分齡培育實施原則。筆者在此作一個補充，提出「宗教教育行政循環」的觀念圖，幫助我們在思想上有一個系統的行政觀念，以推行宗教教育事工。圖表如下：



例如我們欲在堂會推行分齡培育的事工，首先從聖經真理的角度，現代心理學、社會學各種思潮與方法，配合教會現況，尋找出信徒（對象）的需要，繼而釐定清晰的目標。有了目標就選用與之符合的聖經真理施教，正是課程釐定學問。有了內容就決定運用甚麼教學法，選取甚麼模式與組織來推行。具備以上一切也只不過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是行政工作，就是具體實施以上計劃的安排，諸如人才的選拔與培訓，場地的分配與使用，各種設施的預備等。最後是檢討的環節，在推行過程中要不斷的檢視，並要作最終的檢討，看是否能滿足信徒的需要、是否達成原定的目標等。在這個息息不斷的宗教教育行政循環下，以基督為核心帶領，不斷改進宗教教育事工，完成擴展神國的使命。

宗教教育既然是一門實用神學，就非常講求其中的實用性。黃碩然博士的文章理論與實踐並重，使教牧同工能更加有效地應用其中的內容。筆者提供一個「宗教教育對象分析表」（參考下圖），希望使「分齡培育的教牧領導策略」的理論變成更具體可行的方案。此分析表共有九欄：第一欄列出十個年齡階段；第二欄是年齡特徵的介紹，坊間不少宗教教育書籍多有介紹；第三至九欄則由教牧同工與教會領袖一同分析與填寫，按不同堂會的現況加以分析與討論：教會會眾的年齡與人數分布如何、信徒的背景、文化與潮流對他們的影響、不同年齡階段的信徒對教會有何貢獻、教會又有甚麼資源可供給他們等等。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就可以尋找出不同年齡階段信徒的需要，最後按年齡階段人數的多少、教會事工的先後次序、教會資源的多寡，提出具體可行的目標來。此分析表不能為教牧同工提供任何計劃，卻能幫助同工洞察教會的需要，從而按著神賜給眾同工的智慧，按部就班的完成神所給予的使命！

現代教牧應有的質素與形象

張慕皚

二十一世紀需要怎麼樣的傳道人？回答這問題必須從三方面探討：一、社會的趨勢；二、聖經中的教會觀和事奉觀；三、今日教會所面對的特殊情況。

在此首先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文化潮流和教會發展的一些重要趨勢，再指出在這些時代趨勢中，教會需要怎樣的傳道人，帶領她進入二十一世紀。

今日的教會和傳道人必須了解和迫切地回應幾方面的文化潮流，當中包括：後現代和新紀元思想、資訊氾濫和後文字時代的衝擊，以及超道德時代中的個人主義。教會發展方面，也有很多值得關注的趨勢，包括心靈問題的探索、動感的敬拜取代靜態的崇拜、信徒承擔少而要求多的心態，還有「神蹟」和「神道」的教會路線上的掙扎。

一、時代的趨勢

二十一世紀將會是東西文化混雜，各大宗教競爭激烈，道德防線徹底崩潰的黑暗時代。在一個尋求寬容和彼此接納的多元文化中，人需要權威和絕對真理的引導，但因其自大和遠離獨一真神而無法得著，就如神在阿摩司書之中宣稱：

主耶和華如此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他們必飄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當那日，美貌的處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乾渴發昏。

這也是保羅所宣稱危險和失控的末世時代。以下幾方面的文化趨勢，對教會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是這時代的教會領袖必須了解和面對的。

（一）後現代和新紀元

過去二千年基督教的思想主宰全球的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歷史以基督耶穌的降生為分界線，而創世記中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的創造過程亦成為普世遵奉的作息循環。聖經的價值觀更深深地影響了西方民主理想的建立、經濟發展和科學研究。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擴展，把基督教的影響推展到其他發展中國家。

但隨著二十世紀的結束，基督教領袖逐漸覺察，基督教在西方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亦迅速減弱。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和新紀元運動的思維不謀而合，對這世代人的思想和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新紀元運動更宣稱，根據星座學的研究，二千年來由基督教思想所領導的世界文化潮流已成為過去；世界將由雙魚座時代進入寶瓶座時代。

在這種情況之下，基督教領袖也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而宣稱後基督教時代的來臨。1995年其中一期《今日基督教》發表了一篇有關如何接觸後基督教時期的第一代文章；1996年，信仰更保守的《慕迪雜誌》也刊載了討論如何在後基督教時代生活的專文。英國神學家高寧志(Timothy J. Gorriage)更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年為後基督教時代的開始。

「後現代」一詞見於1820年代；而以「後現代主義」一詞用作書名，則出現於1926年。真正有關後現代的討論始於六十年代，而這些討論初期也只局限於藝術界。八十年代開始，後現代的討論才由藝術圈子延伸至哲學界和其他思想領域。

「現代世界觀」是一個以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思想為基礎的世界觀。它推翻了傳統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這種人本主義以人的理性為衡量宇宙萬物的最終根據。「現代主義」假設真理是客觀的、肯定的，人憑自己的思想就可以尋求而得著。

後現代主義推翻了現代主義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否定了絕對和客觀真理的可能性。理性作為尋求真理的角色備受質疑；知識只有個人性和地區性的意義，因此沒有任何真理或知識具備普世性的意義 (meta-narrative)。在釋經上，後現代主義的原則亦否定聖經真理普世性的意義，聖經權威在於釋經者和讀經者，而不在於經文本身。

這種後現代的理論和新紀元運動的觀點正好互相配合。新紀元是一種泛神論，也是混合的信仰，串連了現代的心理學、物理學、東方神祕主義、通靈交鬼的祕術、全人醫治的醫學理論、環保運動、音樂和電影藝術等，成為一個對時代影響深遠的文化網絡。

新紀元運動者反對西方思想中的心物二分的理論，認為宇宙乃是一種本質，眾生一體。他們指出，在物理學的研究中，次原子世界裡只有運動，卻沒有運動的物質，因此宇宙是一個意識。他們所追求的，就是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建立大同世界和眾生一體的宇宙現象。生活上，據台灣的胡因夢指出，新紀元是心靈的革命，反對物質的追求和束縛，尋求心靈的滿足。又如曹文方所說，新紀元是尋求一個超越人種、膚色、國籍及宗教流派的大同世界。

在倫理道德上，後現代主義和新紀元思想都鼓吹互相接納，彼此寬容的多元文化。世上無絕對的真理，因而沒有是、非、對、錯的分別。

人並非活在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中，而是活在超道德的現實裡。因此，第二次大戰時六百萬猶太人遭屠殺，也不是甚麼邪惡的事，只是當時的猶太人選擇在那種現實中過活而已。

在後現代主義和新紀元思想的薰陶下，很多傳統界線都被弄得模糊不清。男女不但是「平等」，更是一樣的。中性服裝和衣飾就是這種觀念的表達，同性戀和同性婚姻更是一件美事。最近醫學界宣稱男性也可以懷孕產子，如果屬實，性別界線的最後防線，也就宣告崩潰了。

福音派神學家韋士 (David F. Wells) 在探討後現代思想所帶來的社會現象時，指出演藝界早就在宣傳這種界線的突破，例如歌星米高積遜 (Michael Jackson) 利用整容技術，變得愈來愈像他的姊妹；而女明星麥當娜 (Madonna) 在韋士的眼光中，更是這方面的表表者：

沒有人比流行歌星麥當娜更懂得在大眾文化中有效地覺察並利用界線的崩潰，她的事業其實就是在不斷的地跨越界限。她是童貞淫娃的精粹，時而精靈超脫，時而粗俗不堪；時而脆弱不堪一擊，時而硬朗如防彈衣；時而放蕩不羈，時而莊嚴肅穆。從多方面看，她實在是後現代的完美化身：華而不實，動而無目標，自我創造一個不斷為變而變的角色。在她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動態和開放的，所有的界限和禁忌都付諸東流，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在沒有普世性的真理 (meta-narratives) 的情況中，沒有建構性的意義可以被視為超越個人喜好的，因此，對、錯、好、壞、正、邪、等的分別不但已經崩潰，而且更變成是不合時宜的。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將會是一個「大同」世界，在這種文化裡，我們將見到正邪混合的現象，是非對錯不再有意義（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桃色事件是一個先兆）。人類普遍追求靈性的滿足，但這種靈性的振興來自甚麼源頭、是善是邪則無關重要，《心靈雞湯》如此流行便是一例。男女有別，這不再是真理；聖靈和邪靈的工作也不必分辨。就如以賽亞宣稱：「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賽五 20）

(二) 資訊氾濫與文字時代

現代社會的另一個明顯趨勢，就是電腦科技發達所帶來的資訊氾濫。任何資訊科技落後的社會，在經濟和社會整體的發展上都必然落後。在傳播科技發達的今天，年輕一代雖然受過文字教育，卻愈來愈少使用文字，他們愛看電視、唱卡拉OK、玩電子遊戲機和電腦。這些由MTV薰陶出來的一代，所看的是少文字、多圖像的書。教育界亦開始使用視、聽、唱三合一的教育器材。不斷推陳出新的電腦教育器材、軟件及內容豐富的視聽電子字典，都在挑戰以文字為主的教育事業。

教會方面，誦讀聖經的錄音帶早已面世，也有機構將整本NIV(英文世界中最暢銷的聖經譯本)製成錄像帶。香港也有機構將聖經的內容用漫畫形式表達，不但能吸引兒童，同樣也吸引成年人。

我們已經進入後文字時代。相信文字不會消失，但其重要性將不斷減低，真理的領受已不再是命題式的 (Propositionally)，而是視覺式的 (Visually)。教會和神學教育必須善用不斷創新的傳媒科技，在培育事工和福音事工上更有效地發揮鹽和光的作用。

在後文字時代中，教會的信息傳遞應盡量圖像化，一方面是因為年輕一代主要生活在圖像世界之中，字字珠璣的講道和教導方式不能吸引他們；另一方面是因為教會崇拜中的講道時間愈來愈長，又沒有適合的喻道故事、個人見證和事例等配合，因而沈悶不堪。根據調查，美國的教會，講道已不再是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的短講：七十分鐘的崇拜中，講道佔了三十五分鐘，而一百五十分鐘的崇拜，講道則佔了七十五分鐘。因此，為適切這一代的需要，講道者在這後文字時代中，必須以圖像化的形式把信息有效地傳遞出去。

信息傳遞圖像化，並非新奇的事，聖經中舊約眾先知的宣講都充滿文字圖畫 (Word pictures)，以西結書中的異象和先知實地式示範的行動，更令信息深入人心。基督的教導和宣講也運用很多比喻；還有啟示錄的

異象和眾多的隱喻，都是圖像化的表達。整本聖經的啟示，主要是用生動的故事形式，透過描述人與神相遇的事蹟帶出真理；基督的道成肉身更是神用圖像化的形式，將祂最高的啟示展現在人類歷史中。

在這後文字時代中，教會必須學習善用一切有效的傳訊科技，用最震撼人心的方法，把神的信息傳遞給這一代在電腦、電視和卡拉OK等傳播科技產品陪伴下長大的一群。神的啟示既是圖像化的，今天傳道人的講道也應該如此。

（三）人權高漲，心靈空虛

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在本世紀所帶來可怕的極權政治，給人類留下不能磨滅的記憶。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引發近代人權運動的迅速發展，隨著發展的，還有少數民族的權益、婦女的平權運動、兒童的權利和動物的權益的運動等。

任何理論若被過分強調而失去平衡，必定帶來不良的後果，人權運動也不例外。人權的高漲，容易帶來公德心的失落和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因而，美國近年鼓吹以「責任」平衡「人權」，這是一個健康的趨勢。可惜個人主義已經根深柢固，不容易拔除，而且自我中心是人罪性的流露，只有基督十架的救贖，才能勝過自私的人性，因為基督的十架要求跟隨祂的人捨己和棄權。

二十世紀的民主運動，雖然帶來人類前所未有的個人自由，使人從不良的社會和政治約束中得到釋放，但這種自由的濫用卻為人類帶來另一方面的痛苦，就是在沒有約束的自由中，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方向。以前在極權政治下，人生的方向是別人指定的，現在的自由卻迫使人要自己去尋找人生的方向和意義，這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類心靈空虛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世紀初所興起的幾種主義的薰陶，使心靈空虛成為愈來愈嚴重的青少年問題。馬列主義嘗試淘汰宗教、進化論低貶人的價

值、科學主義和自然主義否定超自然的靈界事物，而無神的實存主義則帶來悲觀、無奈和無助的人生觀。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人類發現物質的享受不能滿足心靈的需要，反而製造出心靈的大真空，很多思想和理論亦因此在教會內外應運而生，嘗試探索和醫治人類這心靈空虛的世紀絕症。毒品和各種精神科藥物、人文主義的心理學、風水、星座、交鬼、特異功能和各類迷信的追求，還有極端教派、異端和邪教的活動，都是解決人類心靈空虛和缺乏能力的一些嘗試。最值得留意的，是努力滲透歐美文化的「新紀元運動」。這種混合了一些歪曲了的基督教思想、邪教、通靈術、心理學、科學和東方神祕主義的「非宗教的宗教」，近年已經在台灣和香港積極拓展。

教會方面，靈恩運動的一、二、三波、積極和可能性的思想、心理輔導的流行，還有近年熱門的靈修神學和屬靈操練技巧等，都印證了教會在積極地回應這時代的心靈爭奪戰。可惜教會中的這些運動往往走向兩個極端，有的如某些靈恩運動，傾向於走「即食」和「速遞」的捷徑，過分簡化屬靈的追求；另一個極端卻把屬靈的操練變成複雜難行的大包袱，而且當中還摻雜了一些其他宗教，甚至新紀元運動的做法。至於其他一些對應這時代人類心靈問題的理論，則缺乏穩固的聖經基礎。

二、時代的教會

以上的討論嘗試從複雜的社會和文化潮流中勾畫出幾種對未來教會事工影響特別深遠的文化趨勢。要明白教會在二十一世紀需要怎樣的人才，我們還需明白教會在這時代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1) 敬拜的更新——二十一世紀的崇拜聚會，將以動感的敬拜取代靜態的崇拜。在這強調個人主義的人權社會中，敬拜不再是被動的，信徒要求更多的投入和參與。在後現代重感性、輕理性的潮流中，崇拜聚會也必傾向於感性的發揮；敬拜需要不斷的更新，相信大家都同意，但更新的方向，卻是值得關心的問題。單從敬拜形式入手的改善，不是最

好的路向；有效的敬拜更新，應從信徒屬靈生命的更新入手，這才是正途。

(2)「神蹟」或「神道」的事工路線——靈恩運動將在二十一世紀繼續挑戰教會的事奉路線。靈恩運動以趕鬼、神蹟和預言等超自然能力的彰顯，為推動教會走向更新和增長的動力；但傳統福音派教會卻以「神道」，即聖經的真理，作為傳福音和栽培信徒的主要根據和動力。其實兩派只是所強調的不同，而非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路線。因為靈恩派也教導聖經，而福音派也相信神蹟，兩派的對話和互相學習在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中不斷出現。在這道德淪落、人心空虛的二十一世紀中，深信靈恩的衝擊和挑戰將同樣一波又一波地湧現，而地域邪靈與祈禱佈道將成為繼第三波之後值得留意的靈恩運動方向。教會在這時代中應多教導有關聖靈的真理，方能有效地面對靈恩運動的挑戰。

(3)以人為中心的事奉——由於人權、民主、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意識不斷提升，加上社會上鼓吹建立自我形象，因此另一種值得教會留意的趨勢，就是以信徒的需要為中心的事奉路線。在繁忙和艱難的世代中，很多人都帶著不同的個人和家庭問題進入教會，期望得著「醫治」。教會也趨向為不同需要的人預備不同的事工，以適合他們的需要，因而在一個多選擇的商業社會中，教會提供的訓練和團契也必須是多選擇的。在以個人需要為中心的教會中，過往所謂對宗派和教會的效忠也就逐漸失去。因此資源充足又能提供多元化服務的教會，便能吸引更多的信徒，資源不足的小型教會必然愈來愈難生存。這種以人的需要為中心的事奉，本來亦無可厚非，因主耶穌也到處尋找並滿足人的需要；但千萬不能為了能迎合人的需要 (Seeker Sensitive) 而將真理歪曲或妥協，在堅守聖經的原則下迎合人的需要，才是教會事奉者應有的態度。

(4)教會領導層的擴闊——在強烈的民主和自由意識的衝擊下，信徒要求教會提高行政和事務的透明度，並要求參與教會的決策。同時，

由於都市人工作繁忙，真正能夠委身投入教會事工的信徒領袖不多，因此只能在會議上參與事工，而不能在事工的運作上有分。從負面的角度來看，這將帶來全職同工與信徒領袖在教會決策上的張力，因為直接參與事工與不直接參與事工人，對事情的看法必有不同。從正面的角度而言，在民主自由的氣氛下，教會必須重新為信徒事奉定位，尋求如何讓信徒更多投入教會事工的決策和事奉層面。同時，女性事奉的定位也是急不容緩的，隨著社會上婦女地位的提升，很多宗派和教會都非常關注婦女在教會中應有的角色，並且加以討論。女性按牧的問題，在華人教會中引起不少的爭論，而事實上，近年來亦愈來愈多宗派和教會按立女性為牧師。

以上所提出的時代路向和教會趨勢，不但對今日的傳道人帶來極大的挑戰，更在無形中影響傳道人形象的雕塑。

三、時代的工人

主耶穌的教會如何在後現代、後道德和後文字的後基督教時代中，有效地傳講福音、關懷社會，將大部分取決於這時代傳道人的質素。因為傳道人作為教會的屬靈領導人，他們的榜樣和教導將塑造信徒的靈命和決定教會的路線，因此他們的質素肯定對教會的質素起決定性的作用。

傳道人的質素有兩種，一種是恆常性的，即基本和一般性的質素，也就是任何時代和任何文化中，傳道人都必須具備的質素。另一種則是時代性的質素，是傳道人身處特殊時代中，為了回應時代特殊的環境和需要而必須具備的條件。

在此我們不談傳道人恆常性的質素，就如美好的靈性（結聖靈果子）、注重禱告、熱心傳道、融洽的人際關係和屬靈領導恩賜等。以前的傳道人需要這些條件，二十一世紀的傳道人也同樣需要這些基本條

件。這裡嘗試勾畫的，是傳道人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環境上獨特的需要所應具備的時代性特質。

(一) 理性型如主耶穌基督

二十一世紀是輕理性、重感性的時代，後現代的思想提倡多元文化，新紀元運動將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位置上；在這個只有個人權威而沒有客觀性及普世性權威的時代中，教會需要一群在信仰立場上站穩，能夠帶領教會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牧者。

耶穌基督以「道」的身分降世為人，一方面傳講真理，一方面活出真理，當祂出來傳道時，很多病人等著祂醫治，祂卻對彼得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可一 38）可見祂走的主要是「神道」的事奉路線，而不是「神蹟」的路線。在祂三年多的工作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訓練和教導十二門徒上，而且主要是以「拉比」的身分到處宣講和教導真理。

理性型的傳道人相信聖經是神命題式的啟示，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永恆不易的絕對真理，這種絕對真理的「知識」，帶人進入對神的「認識」。這「認識」是生命的體驗和經歷，而這經歷又感動人實踐事奉，就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指出，得救帶來生命的委身，這委身在於尋求心意（理性）的更新，以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

在這沒有絕對權威的世代中，理性型的牧者應把握聖經的權威，有效地傳講聖經的真理，為這無所適從的一代帶來方向。他必須是能夠活出真理的人，讓人看見他所傳講的真理實際有效。以感性為出發點的後現代思想，在教會中容易帶來高舉經歷、貶低真理的危險；理性型的領袖卻重視將屬靈經歷建立在真理上，就如主耶穌提醒我們，要把房屋建造建基在祂的話語上。感性型的領袖只能為教會帶來曇花一現的蓬勃；理性型的領袖卻能帶來教會穩固的發展，而且注重全人的成長。

理性型的牧者如耶穌一樣，注重教導真理，以「神道」為建立教會的策略，他相信神蹟，卻如主耶穌一樣不以神蹟為事奉的重點。初期教會的領袖，都以祈禱、傳道為首要任務，就如主耶穌般以「拉比」的身分出現。四福音中提及主耶穌教導職分的經文，遠超過提及祂講道職事的經文（雖然兩者的果效相似），這種理性型的領袖，正是教會在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

（二）承擔型如尼希米

我們這一代是缺乏承擔的一代。形成這種潮流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病，當人只顧及自己的需要時，對教會和社會的事便不會有所承擔，因承擔要付出、要犧牲。對一些只尋求自己利益的人，若教會不能提供他個人或家庭的需要，或現在參與的教會比不上別間教會時，便會不辭而別；這就是為甚麼很多原在小型教會的信徒，因教會所提供的「服務質素」不夠水準而轉到中、大型教會去的主要原因。很多大型教會的快速增長，大部分均來自轉會，而不是傳福音的增長。

教會對所屬宗派的效忠也同樣薄弱，上一代的信徒和教會對宗派的效忠純粹出於一種歸屬感，現今的教會往往只選擇性地支持一些對自己教會有幫助的宗派性事工，超宗派的聯合事工更不容易得到堂會的支持。

要改變這種缺乏委身和承擔的趨勢，教會需要像尼希米般的承擔型領袖。尼希米當時在波斯的王宮中當酒政，養尊處優，過著舒適的生活，卻因為這份強烈的承擔感，為遠方耶路撒冷的荒涼而哀哭和禁食，並冒生命的危險，請求王准許他回耶路撒冷建造城牆，並且一去就是十多年。

這時代需要對教會委身的傳道人。不少人慨嘆年輕一代的傳道人，太容易因輕微的事故而在事奉上打退堂鼓或離職進修，給人一種傳道人

對教會沒有承擔的印象。當今真能在教會產生果效的，都是長期作戰的承擔型傳道人，而鮮有短暫牧會而能結出堅實成果的。

承擔型牧者的成就，不純粹因為長時間留在教會崗位上，而是由於擁有尼希米那種對神的愛，和對人的關切所產生的投入感。沒有基督的愛所激發出來的承擔而長期留在教會工作，反會產生更大的悲劇。參孫當士師二十年，但有名無實，一開始便只顧打私人的仗而沒有帶領族人打民族的仗，以致族人也樂於將他交給敵人。奇妙的是，神仍用他自私的行徑成就祂的工作。還有掃羅王，自從神棄絕他而另立大衛後，他仍強霸在王的位上，使神所膏立的大衛不能起來承擔工作。試想今天有多少教會和機構的領袖也是如此？他們應該早日讓位給今日「曠野中的大衛」。

承擔型的領袖不單長期在崗位上，最重要是長期的承擔和委身，這都是救恩歷史所見證的。亞伯拉罕、摩西、約書亞、大衛和保羅都是這一類的領袖。信、望、愛是這些領袖的生命要素，他們都是經得起考驗，在艱難的環境中憑信勇往直前的表率。

二十一世紀將是複雜而艱難的時代，自由和個人主義導致權威隕落，個人和家庭問題愈來愈多，牧養的擔子越發加重，沒有堅強的承擔感，將不易在教會中以愛和忍耐，建立信徒對牧者的接納和信任；沒有長時間委身的牧者，教會難有可觀的成長。

（三）父母型如保羅

二十一世紀將會是複雜而艱難的時代，婚姻關係不再被重視，恩情的泯滅，導致傳統家庭制度瓦解，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個人主義的橫溢導致人際關係崩潰，教會的牧養將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三十年前，平均的牧養比例是二百人對一位牧者，現在的比例大約是七十人對一位牧者，可見人的問題多了，牧養的難度也相對地提高。

在這樣的形勢中，我們需要像保羅一樣的父母型牧者。他在帖撒羅尼迦前書指出：「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跟著他又聲稱：「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帖前二 7、11）。父母型的領袖具備三方面的特質：服侍，權柄和榜樣。

首先，父母的角色就是愛的服侍，而父母的服侍比僕人的服侍往往更體貼入微，就如保羅指出，他如母親乳養信徒，只出於對他們的愛，而這種愛是一種犧牲的愛。這種愛表現於那種不辭勞苦、晝夜辛勞的照顧和服侍。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教導和為門徒洗腳的榜樣，給我們的教訓是「母親」謙卑服侍的愛，遠超過「僕人」的辛勞。

同時，保羅又如父親一樣的教訓、勉勵和督責自己的兒女，這是一幅嚴父慈母的圖畫。時代的牧者，應是恩威並重的父母型牧者，單是「僕人」的角色，未足道出聖經中牧者那種付出和犧牲的愛；「僕人」的事奉亦未能顯出牧者應有的權柄，因此「僕人」並不是全面的牧者形象。在新約多向度的牧者模式中，「牧人」的向度與「父母」的向度最能全面性地表達聖經的教牧形象。

在「僕人」的形象中，「權柄」和「服侍」產生衝突，但「父母」和「牧人」的形象卻能將兩者結合起來，而權柄和服侍的結合是非常重要的。父母的權柄，來自神在家庭的設計，但單以天賦的權柄治理家庭的父母，結果只會失去權柄。聖經中父母的觀念給我們進一步的提醒，父母的權柄除來自神所命定的模式以外，還需要父母以犧牲的愛贏取這種權柄和尊重。因此教會的牧者不能自恃聖經給予他作監督的權柄而強行治理教會，這只會帶來兩種後果：一是信徒口服而心不服，二是牧者和信徒之間起爭鬥。牧者的權柄應像父母一樣，從愛的服侍中逐漸建立，這樣才有穩固的根基。

父母型的教牧形象要求牧者長期牧養教會。焉有父母隨便離開兒女？豈不任勞任怨、不辭勞苦、默默耕耘地照顧兒女。長期的牧職顯然更配合父母的形象。還有，父母型的牧者形象與斤斤計較、處處向教會爭取個人利益和福利的教牧作風截然相反。教會當然應為教牧同工設立完善的福利和退休制度，這是愛心的表現，但傳道人處處爭取自己的權益，就等於自貶為僱工，並且對神缺乏信心。按節數安排工作時間的做法也要小心實行，以免被信徒看為牧者不肯積極投入事奉的藉口——信徒都在工作時間以外投入事奉，而沒有計較時間上的補償。因此牧者按節數工作要得到信徒的了解和認同才可實行，而且應該只作一般性的指引，牧者應隨時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投入事奉，才迎合父母型牧者的要求。

父母型的領袖還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就是為兒女提供為人處事的榜樣，就如保羅對帖撒羅尼迦教會指出：「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摘，有你們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帖前二10），他也同樣向腓立比教會挑戰：「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腓三17）。這也是主耶穌教導的主要模式，就如祂要跟隨祂的人「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太十一29）。

此外，父母型的牧者在教導和事奉上有幾種的動力，第一種是言語的動力，這是一種說服別人的能力，第二種是賞罰的動力，就如基督常提及將來的審判和賞罰，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三種，就是榜樣的動力，這也是學習上最有效的動力。大衛在鼓勵首領和百姓為神的殿作出奉獻時，就首先以自己的榜樣作為鼓勵：「我為神的殿已經盡力……且我心中愛慕我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以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在此可見，傳道人若能在道德操守上活出基督的樣式，讓信徒跟從和效法，便是一位好牧者；特別在這道德淪落，恩情泯滅的世代中，傳道人的榜樣在領人歸主和牧養上有關鍵性的效用。

(四) 協商型如雅各

初期教會時代，當外邦人開始信主加入教會以後，為了使他們適應猶太人的傳統，有人要求外邦信徒守摩西的律法和受割禮。保羅極力反對這種主張，因而引起領袖間很大的爭論。當時作為耶路撒冷教會領袖的雅各，便召開了耶路撒冷會議，一同商討此事，解決問題。

在這次會議中，代表不同意見的人各自發表他們的見解以後，雅各便站起來綜合各方面的意見，作了一個合宜的決定。這決定反映出在整件事的協商過程中，他們都謙虛禱告、倚靠神、等候祂的帶領。因而在給外邦教會的信中，他們可以肯定的宣稱：「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徒十五 28）

在此我們看見雅各的領導模式，他不是大權獨攬的教皇，他樂意等候神的指示，也留意其他人發表的意見。在民主意識膨脹的世代中，信徒在教會裡不再是惟命是從的一群。他們有獨立的想法、不同的意見，批判能力強，要求教會處事「透明度」高，讓他們能參與決策。在這種文化潮流下，獨行獨斷的教會領袖不容易生存，像雅各一樣協商型的領袖才能適應這時代的需要。有人甚至指出，人類歷史中，以往的政治領袖多是男性，而男性好鬥、傾向暴力，因而帶來頻密的戰爭，而女性比較溫文，傾向以協商解決問題，因此在人類渴求和平的二十一世紀，政治舞台將愈來愈多女性冒起，領導世界。這種看法充分反映這時代領導模式的趨勢。

協商型的領袖如雅各一樣，具備幾方面重要的特點：第一，倚靠神的帶領，讓基督在教會中作元首，透過聖靈的引導，幫助教會作適切的決定，深信教會做的決定，也就是聖靈作的決定。第二，使徒行傳的教會民主協商，目的並不是要達成經投票後的少數服從多數，因為他們給外邦教會的信中表明，他們做的決定，是聖靈與他們一同做的決定。若教會以基督為元首，一同尋求基督的心意，則會眾的看法理應一致；我

們也必須相信，聖靈的帶領，很多時候是經過協商顯明出來的。因此，協商型的領袖，並不像邪教的領袖，以為自己在靈的帶領上擁有專利。第三，協商型的領袖也不是一位尋求在處事上達到面面俱圓的「宗教政客」，他必須是具有豐富屬靈經驗的人，對神的心意有精明的洞察力，處事上願意客觀地接受各方面的意見，不偏聽一面之辭，並能作出果斷的決定。

在現今複雜的教會環境中，協商型的領袖是懂得在教會眾多意見和事工方向的分歧中，尋求合一的領袖。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的夏威廉 (Bill Hybels) 將教會的領袖分為十種類型：異像型 (Visionary Leader)、方向型 (Directional Leader)、策略型 (Strategic Leader)、行政型 (Managing Leader)、推動型 (Motivational Leader)、牧養型 (Shepherding Leader)、隊工建 (Team-building Leader)、企業型 (Entrepreneurial Leader)、重建型 (Re-engineering Leader) 和建立橋樑型 (Bridge-building Leader)。夏威廉承認，沒有教會領袖屬於單一類型，而是結合多種類型的綜合式領袖。他提出的第十種類型——建立橋樑型，就是我們所指的協商型。在民主自由的社會中，教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和多元性的事奉，都極需這種懂得建立橋樑的協商型領袖的領導，夏威廉這樣描繪協商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將教會中不同單位納入一個領導的網絡系統中，為了使一個複雜的組織能完成任務。

這工作需要一位極之有彈性的領袖，一位能夠妥協和談判，懂得聆聽和了解別人，能夠在框框以外思考問題的領袖。他不但有外交家的風度，更懂得與不同類型的人建立關係。

在一項事業開始時，作領袖的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圍繞著他，但在教會和機構中就有點不同了，教會中有界分清楚的不同單位，單位的領袖大多不再理會整體的事奉異象，只尋求一己的利益得到照顧。

一位牧師告訴我：「我快沒命了，詩班要求重新設計新袍，青年人想要一個新的室內體育館，差傳部想捐多一些錢出去，主日學需要

更多課室，製作部又想要更多的器材，耆英們要求大字版的聖詩，又有新一代的青少年要求將會議室改裝成一間咖啡吧。」

這位牧者將這些急切的不同要求當作敵人，但這種處境卻需要一位建立橋樑型的領袖，以自己為不同單位的朋友和支持者，尋求將他們聯合起來，並將他們不同的努力和貢獻聚焦起來，完成教會的使命。

夏威廉的描述給我們看見，一位協商型的領袖，在教會裡充分流露靈命的高深和處理人際關係的幹練。

（五）智慧型如所羅門

所羅門王蒙神賜他過人的智慧。一個智慧人有知識，又能將知識適切地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就如他巧妙地分辨和判決爭嬰孩的案件。還有，聖經中的智慧，源頭是神自己，因此智慧人也是一個屬靈人，而且是一個智慧與道德並重的屬靈人；相反，愚昧人就是目中無神的人。

作為現代的智慧型牧者，第一個條件就是多才多藝如所羅門，在傳道書第二章中，他透露自己為了尋求人生的快樂而追求多方面的人生經歷，包括建築、園藝和音樂。其他經文亦顯示他對文學，政治，軍事和人生各方面的智慧和閱歷都有深入的掌握。

在今天這複雜的社會中，各行各業的領袖都必須具備廣博的知識，同時又要有工作所需的專長；傳道人也不例外，除了靈性要高深以外，還必須學養精深。傳統的西方神學教育，要求傳道人有基本人文學科的學士程度方可入學，再加上三年的道學碩士訓練；在此之外，還加上屬靈品格的操練和教會實習；因此傳道人的學養比教會裡一般信徒都廣闊高深。在傳統的西方社會裡，傳道人都被尊崇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人。

在一般人學歷不斷提升的知識大爆炸時代中，傳道人也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傳道人的基本訓練需要提升到教牧學博士程度。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需要不斷參加額外的課程訓

練，才得以維持其專業資格；未來的傳道人，也必須經常進修，才能追得上牧會的新趨勢和神學的新思潮。

今日的社會問題比從前複雜，新的問題更不斷湧現。今日的傳道人不能再單處理教會裡面信徒的屬靈問題，也必須認識並協助信徒處理他們在家庭、工作和社會層面上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很多信徒都參加神學院開辦的晚間神學課程，或其他機構所開設的講座，他們對教會和社會的種種問題可能比傳道人知的更多，難怪常常聽見信徒投訴教會的傳道人在牧養上供應不足。因此神學院除了訓練第一次入讀神學院的學生以外，還需要開設一些專為傳道人進修的課程。在這方面，較多年輕而剛進修完畢的講師的神學院應具優勢，因為他們所學的，都是最新和最迎合時代需要的學問。

對這時代的傳道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吸收多少知識，而是能把握治學方法、探討問題的途徑和知道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資料。在這方面，傳道人對電腦科技應有充分的知識，不但能利用最先進的電腦科技，擴闊自己的思想領域，還能帶領教會把最新的器材和設施用在講道、教導和事工的發展上。

智慧型，多才多藝的現代傳道人，並不需要凡事親力親為，無論大小都投入去領導；反而應該如聖經的教導，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在教會中做好牧養和教導的工作。但若能在這複雜而多變的時代中，對社會情況和信徒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則必能在講道和牧養上適切教會的需要。試想一個對後現代思想一無所知的牧者，對這一代年輕人的心態沒有了解，又怎能有效地牧養他們？又試想今日一般人所關心的人權、政教關係、同性戀合法化、安樂死和無性生殖等社會問題，傳道人若完全沒有探討的興趣，就沒法在講道和教導中充當先知的角色，更不用說輔導被這些社會問題所困擾的人。還有，教會的事奉觀念日新月異，例如從前在福音的工作上主要有個人佈道、群眾佈道的理念，現在卻有人指

出，除這兩種佈道形式以外，更重要的是教會佈道。又例如，從前流行教會質和量的增長觀念，已經不再合潮流，現在流行的是健康教會的新理想。因此，智慧型的教牧人員，必須對不斷創新的教會和事奉觀念把握清楚，並且客觀地作評估，因為不是所有的新觀念都是值得採用的，就如近年流行的地域邪靈和祈禱佈道運動，就是一些極富爭論性，而頗富商榷性的新觀念。

在此必須再一次強調，現代的智慧型牧人，不應只有頭腦的知識，更要是首先具備屬靈智慧的人，因所羅門提醒我們：「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現代的智慧型牧者，是敬虔愛神的牧者，他的敬虔叫他追求成為一位多才多藝、迎合時代需要的牧者。

（六）爭戰型如大衛

所羅門是建造型的君王，他用神賜給他的智慧，建造自己的宮殿、神的聖殿和國家，他使以色列成為富強的國家。他的父親大衛也是歷史上偉大的君王，但他是爭戰型的君王。少時在曠野與野獸搏鬥，後來靠神的恩典擊殺了巨人歌利亞；成為民族英雄後，反而要面對掃羅王的嫉妒和追殺，後來成為一國之君，又竟遭自己的兒子押沙龍篡位和追擊。由此可見，他一生大部分年日都在爭戰中度過。

末世是屬靈爭戰猛烈的時代，撒但不遺餘力地要破壞神國的進展和社會秩序，帶來愈來愈嚴重的道德問題、戰爭問題、經濟問題和人命的傷亡。教會在這時代必須面對撒但的挑戰，因此以屬靈爭戰為題的書極之暢銷，有關屬靈爭戰的講座更吸引很多傳道人和信徒參加，很多教會熱衷於趕鬼和釋放的禱告，對付地域邪靈的祈禱佈道運動更是趨之若鶩。因此，作為時代的傳道人，必須關心末世的屬靈爭戰，並懂得如何投入。

末世屬靈爭戰的事實無可置疑，但在這方面，教會應有的立場和爭戰的方式則極具爭論性。神的原意不是要教會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對付

撒但和邪靈的工作上，祂要求我們集中力量在傳道和牧養上，主耶穌和保羅給我們在這方面的榜樣是：有鬼則要趕鬼，但不必刻意地搜尋一些鬼去驅趕。傳道人也應小心分辨精神病和被鬼附的情況。

屬靈繪圖和搜尋邪靈的祈禱佈道運動，將撒但的勢力過分誇大，卻低估了聖靈和福音的能力，故爭戰型的傳道人在這時代特別需要留意聖經中屬靈爭戰的策略。以弗所書第六章給我們看見教會在屬靈爭戰上應有的攻防戰術，首先是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在防守方面，有屬靈品格的操練，這包括真理的帶子、公義的護心鏡、信心的籐牌，和救恩的頭盔。在進攻的武器上，包括平安福音的鞋，靠聖靈警醒禱告，和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在此我們看見，最佳的爭戰策略，就是靈命的操練、禱告的實踐、真理的裝備，以及高舉基督和十架的福音工作。

總而言之，保羅提醒我們，爭戰型的領袖應注重個人靈命的成長，在牧養方面走「神道」而不是「神蹟」的路線，在事奉上刻意注重佈道和宣教。這樣的傳道人不會給撒但留地步，卻能在屬靈的爭戰上使撒但和牠的隨從一敗塗地，就如使徒約翰指出：「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三8）；「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十二11）

因此，這末世中爭戰型的牧者，是用神的道見證並高舉基督，帶領教會以傳福音為首要任務的牧者。當教會積極履行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時，乃將領人歸主和真理的栽培看為息息相關的工作，如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因此履行大使命的教會，在增長上是質和量齊驅並進的增長，也就是健康教會的增長。在追求教會更新和復興的今天，大使命所帶來的是教會長期的興旺，這是比「復興」和「更新」更合神心意的追求。因為「復興」和「更新」意味著教會的冷淡和衰落，但遵行基督大使命的教會，必然長久興旺。現代爭戰型的牧者是福音的勇士。

四、結語

這裡提出六種類型的領袖，並不表示這些領袖只有單一的屬靈氣質。而是說，他們生命中突顯的質素，是今天屬靈領袖所需要的。例如基督是最完美的領袖典範，卻來到世上以道的啟示和救贖為目標，並以教導真理為主要的任務。

因此，這六種類型也是生命的質素。今天的領袖應追求這六種質素的結合，但現實裡有些人只擁有其中一兩種特點，而有些則擁有較多。

在反理性和反權威的時代，我們需要像主耶穌的理性型領袖。

在缺乏承擔的世代，我們需要像尼希米一樣的承擔型領袖。

在充滿各種創傷的時代，我們需要像保羅一樣的父母型領袖。

在民主意識高漲的時代，我們需要如雅各一樣的協商型領袖。

在資訊氾濫的時代，我們需要如所羅門一樣的智慧型領袖。

在屬靈爭戰激烈的時代，我們需要像大衛一樣的爭戰型領袖。